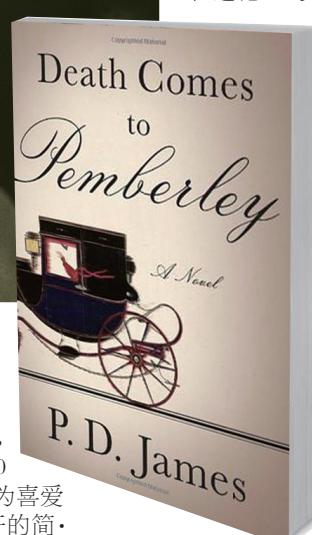


向经典致敬

P.D.詹姆斯是英国当代最著名的推理小说女作家，被尊称为“推理小说第一夫人”。她迄今为止共出版了20部作品，其所塑造的亚当·达格利什探长是英国民众最为喜爱的侦探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还是一位铁杆的简·奥斯丁迷。在完成最后一部达格利什系列小说《自费病人》之后，年逾九旬的她决定要轻松一下，完成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我想把我的两股热情——写侦探小说和读简·奥斯丁——聚合到一起，如果能重温《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同时撰写一部原创、有趣、不可思议的探案故事，一定会非常有趣。”直至2011年，P.D.詹姆斯终于出版了《死亡来到彭伯里》，独辟蹊径，用谋杀和推理的故事情节为爱情小说续篇，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伊丽莎白与达西婚后的第6年，此时夫妻二人依然恩爱无限、瑟瑟和谐，两个儿子的降生更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彭伯里庄园在伊丽莎白的精心操持下井井有条，一切都显得温馨美好——直到一年一度的安妮夫人舞会前夜，一辆顶着风雨疾驰进庄园的马车打破了彭伯里的宁静。这位不速之客是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现在的韦翰太太。惊恐万状的她一上便尖厉地叫喊：“韦翰死了！”达西立刻带人前去搜寻，最终在庄外的小树林里发现了酩酊大醉、浑身是血的韦翰和他的好朋友丹尼的尸体。谁是杀害丹尼



《死亡来到彭伯里》英文版

之下跳下马车，朝树林深处走去。韦翰连忙下车追赶，两人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过了大约一刻钟，停留在原地的莉迪亚和车夫突然听到树林中传来几声枪响。惊慌失措的莉迪亚以为丈夫已惨遭不测，急忙命令车夫驾车去彭伯里庄园求救。待达西一行人赶到小树林时，发现悲痛欲绝的韦翰正俯在丹尼的尸首上，嘴里还喃喃自语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是我的错。”

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达西心情复杂，一方面对他韦翰恨之入骨，他无法忘记是韦翰忘恩负义地觊觎家族财产，怂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私奔；是韦翰卑劣龌龊地在伊丽莎白耳边诋毁达西的名誉，险些破坏了二人的美满姻缘，也是他带莉迪亚离家出走，险些令班奈特一家身败名裂。他憎恶韦翰，甚至不愿意提及这个名字，彭伯里庄园的任何社交活动都不会见到

上尉的真正凶手，是劣迹斑斑的韦翰还是另有其人？这场突如其来的谋杀案使恬静舒适的彭伯里庄园顿时笼罩在一片恐怖而沉重的气氛中。

表面上看，《死亡来到彭伯里》是一部典型的悬疑推理小说，然而詹姆斯并没有将悬疑恐怖的因素与《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情节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在设置层层悬念的基础上，努力挖掘人物的灵魂深处。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是游戏中的棋子，还是具有复杂性格和道德思考的人。这一点在主人公达西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坚守责任的达西先生

在《死亡来到彭伯里》中，达西一改往日孤傲冷峻、特立独行的形象，变得忧郁和自省，他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对往事的追忆和复杂的内心纠葛中，难以自拔。达西深爱着伊丽莎白，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总时时提醒自己，他的婚姻违背了自幼灌输给他的行为准则，违背了父母记忆中的信念，违背了他的阶级和财富赋予他的责任，这种想法令他开始怀疑自我，显得心事重重。而小树林里的凶案使他的内心再起波澜。

案发当晚，韦翰与妻子莉迪亚、好友丹尼同乘马车赶往彭伯里庄园，途经庄园边的小树林时，韦翰和丹尼起了争执，丹尼一气之下跳下马车，朝树林深处走去。韦翰连忙下车追赶，两人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过了大约一刻钟，停留在原地的莉迪亚和车夫突然听到树林中传来几声枪响。惊慌失措的莉迪亚以为丈夫已惨遭不测，急忙命令车夫驾车去彭伯里庄园求救。待达西一行人赶到小树林时，发现悲痛欲绝的韦翰正俯在丹尼的尸首上，嘴里还喃喃自语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是我的错。”

面对眼前的这一幕，达西心情复杂，一方面对他韦翰恨之入骨，他无法忘记是韦翰忘恩负义地觊觎家族财产，怂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私奔；是韦翰卑劣龌龊地在伊丽莎白耳边诋毁达西的名誉，险些破坏了二人的美满姻缘，也是他带莉迪亚离家出走，险些令班奈特一家身败名裂。他憎恶韦翰，甚至不愿意提及这个名字，彭伯里庄园的任何社交活动都不会见到

他的身影。但另一方面，无论多么讨厌韦翰，敏锐的直觉和周密的推理令达西相信韦翰不可能是杀人凶手。19世纪初的刑侦手段极为有限，法医连嫌犯身上的血迹都无法辨认，更不用说利用指纹或DNA了，案件的审判只能依赖目击者的证词和陪审团的判断。然而，从现场看，一切不利因素都指向韦翰：他是案发现场唯一与受害者在一起的人，且之前与受害人发生口角，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在搜寻的众人面前，他亲口承认是自己杀害了丹尼。加之他在当地早已名声扫地，在无法找到其他嫌疑人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认定他为凶手。

一审结束后，陪审团认为韦翰有罪。但达西依然力挺韦翰，为了使他不会含冤而死，达西四处奔走，聘请最好的律师，并在二审的法庭上尽力与法官和原告律师周旋。达西既要保护妹妹和妻子一家的声誉，避免谈及拒绝韦翰进入彭伯里庄园的原因，又要将证词引向有利于韦翰的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在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达西的内心一直处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每次看到韦翰，达西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行，他对家人造成的伤害以及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他甚至希望凶案中死去的人是韦翰，这样他就能摆脱这个梦魇般的人物。达西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帮助韦翰，但他随即打消了念头，毕竟韦翰是自己的妹夫，在谋杀案中又的确无辜。最终，道德的良知和家庭的责任感占了上风，指引达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围绕着“责任”这一主题，詹姆斯还富有创意地塑造了一个新的角色形象——达西的曾祖父乔治·达西。他脾气古怪，不愿意做庄园主，喜欢过简单自由的生活。他盖了一座木屋，带着唯一的伙伴——爱犬“士兵”在林中独自生活，远离世事的纷扰，读书沉思，自得其乐。乔治60岁时，“士兵”得了重病，痛苦地呻吟，乔治毅然拔出手枪射死了它，随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死前，他留下字条，希望能够和爱犬葬在一起。但达西的家人认为这样做是家族的耻辱，他们违背了老人的意愿，把他葬在家族墓地，而把“士兵”孤零零地埋在树林里。从此，达西家族以史为鉴，给下一代灌输身为贵族所应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达西童年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两个达西面对人生做出了不同选择，一个坚守地位与财富而为责任所累，一个放弃富贵与名利而无拘无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詹姆斯对待财富与责任的看法。

小人物的光荣与梦想

与《傲慢与偏见》不同，詹姆斯对韦翰个人命运的重新书写引发了人们对生存境遇的深层思考，体现了她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同情。

《死亡来到彭伯里》中，韦翰出场即成为小树林凶杀案的重要嫌疑人，案件调查中一直被羁押在狱。作者并没有给韦翰

太多的话语权，即使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证词也饱受质疑，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和现今困窘的生活，使得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鄙视和怀疑。很少有人了解他婚后的生活，只有菲茨威廉上校对他这几年的经历略知一二。与莉迪亚结婚后，韦翰参加了1798年英军镇压爱尔兰叛乱的战役，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并获得了勋章。然而民族英雄的光环并没有给韦翰带来所渴望的财富与地位，几次应聘到手的职位没干多久就丢了，缺乏足够的经济来源，加之花钱大手大脚，韦翰和莉迪亚的生活居无定所，时常要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和救济。在小说的前半部分，韦翰给人们留下的依然是卑劣轻浮、无所事事的形象，战场上的壮举非但没能改变人们的看法，反而增加了他谋杀丹尼的嫌疑。若不是关键时刻真正的凶手小比德韦尔的忏悔书被及时提交给二审法官，韦翰恐怕得含冤了。韦翰被无罪释放后找到了达西，详述了事情始末。细心的读者不难从对话中发现，其实韦翰也有理想和追求，渴望出人头地，但是低微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即使仪表堂堂、才华出众也无法获得像达西一样的地位和财富，身份的跨越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难以实现，可行的办法就是娶一个名门望族的小姐，通过婚姻关系一步登天。野心勃勃的韦翰选择了后者，并在这些看似便捷却又充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自己声名狼藉。试想如果韦翰也拥有达西一样显赫的家世，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们定会对他另眼相看。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以权势和财富衡量人的社会里，他是不会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野心的。因此，在小说的结尾，詹姆斯让韦翰移居美洲新大陆。也许在提倡自由平等的土地上，韦翰能够大显身手，凭借个人的奋斗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

作为一名忠实的粉丝，詹姆斯对简·奥斯汀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尽管《死亡来到彭伯里》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刻画上与《傲慢与偏见》大相径庭，但是小说的语言恬静清新，节奏和缓，时而穿插着温和的反讽，大有昔日简·奥斯汀的风范。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浪博恩的班奈特夫妇把五个女儿中的四个都嫁了出去，真是幸运，这已经得到了麦里屯女性居民的普遍认同。”这句话不禁使人们立刻想到了《傲慢与偏见》开篇的经典语录，“凡是有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了一条举世公认的原则。”这种略带模仿痕迹的俏皮语言令人阅读起来格外亲切，感觉似乎是在简·奥斯汀的引领下又重新回到了19世纪初的英国田园生活。

当然，若把《死亡来到彭伯里》看作《傲慢与偏见》的续篇，小说中仍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詹姆斯对原著中最令人喜爱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刻画略显呆板。在小说中，婚后的伊丽莎白似乎少了些睿智与爽朗，多了些稳重与矜持，她表现得温婉贤惠、体贴周全，总是在默默地支持着丈夫达西，很少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令简迷们不免有些失望。

■ 动 态

普拉斯诗集在京发布

本报讯 1月11日晚，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好文字网”合作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店德胜门店召开了《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新书发布会暨朗诵会，诗人王家新、翻译家傅浩、作家苗炜、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黄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超等，朗诵和纪念了美国战后最伟大的女诗人普拉斯，分享了阅读她的诗歌集《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和自传体小说《钟罩》的阅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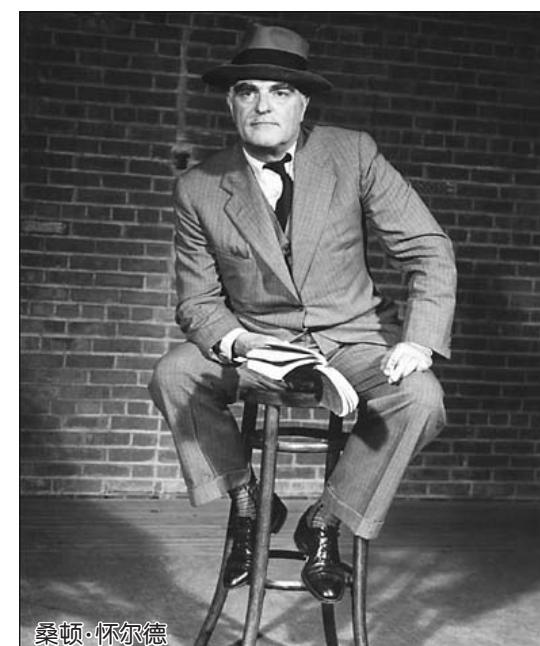
《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是美国战后最伟大的女诗人，1982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全集译本，也是国内首部完整的普拉斯诗集，书名出自录入诗集的一首普拉斯诗作——《一生》：“……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以猫的嗓音闲谈着离别，离别。/年龄与恐惧像护士一样看顾她，/一个溺水的人，抱怨这巨大的寒冷，/从大海中爬起。”

该诗集系普拉斯的丈夫、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于1981年汇集成编纂的《普拉斯诗全集》。该诗集在1982年为普拉斯赢得了迟来19年的普利策诗歌奖。

现场嘉宾认为，普拉斯的诗充满了强烈的意象性，它们有的宏大荒寂，有的怪诞戏谑，但几乎都隐含着一种内敛的悲伤。普拉斯生前就曾出版过两部诗集并获得了许多好评，不过她在文学界的声名鹊起确实在她的身后。一方面，人们哀叹她的悲剧人生和过早凋零的天才；另一方面，各种关注女性命运的思想团体又援引普拉斯为知己，将她视为遭受父权压迫摧残的样本，并由此派生出对普拉斯诗歌的多种文本解读。普拉斯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经成为一个当代文学的重要课题，而在国内依然方兴未艾。这本翻译诗集的出版或许能帮助中国的读者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位传奇女诗人的思想与情感。

桑顿·怀尔德：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活过

□吴 萍



桥》中又将此问题慎重重提。

1914年7月20日，南美秘鲁圣路易斯雷大桥断裂。5个旅者坠谷身亡。目击者朱尼帕修士发问：为什么偏偏是这5个人？是巧合，还是因果，还是“上帝的旨意和行动”？借此，朱尼帕修士深入5个人的私密生活，待他凑齐每个人的个性和境遇拼图时，仍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好在朱尼帕在这趟探索之旅中多少收获了些有关人生、社会、宗教以及爱的经验。

“爱”与“死亡”一直是怀尔德热衷的话题，在《圣路易斯雷大桥》中，他将爱拆解成各种形式。母女之爱、手足之爱、暧昧之爱、物欲之爱、人本之爱等，在怀尔德的笔下呈现出各种光泽，牵杂嫉妒、肉欲、怜悯或权力等各种杂质，不纯粹但真实。

蒙特马约尔女侯爵因得不到女儿的爱而分外卖力地表达爱，那些传世的问安家书其实让她成了“表现母爱的演员”，这呈现了母女的志不同道不合，沟通的死结最终酿成彼此内心的倾轧。同样，带着自传色彩（怀尔德也是幸存的双生子之一）的曼纽尔与伊斯特班同爱女伶而生隐秘的嫉妒和猜忌，曼纽尔死于意外后，伊斯特班逃脱了爱情的追剿，却难逃失去兄弟后的蚀骨孤独。而皮奥叔叔对佩利绍莱有着疯狂而复杂的爱，其偏执与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中的佐助相仿佛。

朱尼帕修士幻想采集5人标本便可作为“善恶因果”的明证，结果却是行恶者活得更久，善良者却被上帝提前招领。那么，谁来承担宽恕罪恶的责任？宗教吗？怀尔德似乎故意保持与宗教的距离，摇摆于信任与怀疑之间。佩利绍莱为私情不外泄，才想起叫圣母玛利亚来帮忙，他让曼纽尔以圣母玛利亚的心发誓保守秘密。这似乎才是信仰的一点实用意义。

《圣路易斯雷大桥》故事之始有言：“很快我们就会死去，所有关于这5个人的记忆，都会随风而去。”以此延伸，

《我们的小镇》里所有人的记忆也都会随风而去，这世间任何人在离开世界后，都无法佐证自己曾经活过。因此，女修道院院长最后告诉蒙特马约尔女侯爵的女儿：“我们所有人都是失败者”。《我们的小镇》和《圣路易斯雷大桥》中，怀尔德满腔都是对人生虚无的肯定。

虽然在文字里高举人生无意义的大旗，怀尔德内心却一直肯定爱和记忆，也肯定死亡，形成一则意义含混的悖论。《圣路易斯雷大桥》中，“爱”作为跨越生死国度的桥，给荒谬的人生塞入了几缕实在。可是，爱的时限性被“活着”所拘囿，即便被“别人的记忆”提及，也不具“永恒”的特征。“爱”这一唯一的幸存之物，惟一的意义，是否能颠覆人生的无意义？《我们的小镇》抑或《圣路易斯雷大桥》，怀尔德都单独讨论了“爱”，试图以此让人感到一星暖意。艾米丽再回人间，重新发现“爱之真之美”，怀尔德故意让死者的爱镌刻入“但是有这份爱已足够……对于爱来说，记忆也并非不可或缺”中。缺了“回忆”，“爱”又如何凭寄？怀尔德的矛盾与含混，也许正是其作品的开放性和吸引力之所在，也让人无法界定他的人生观是悲观抑或乐观。太多作家或哲学家在倾力消抹人生的暖度和活跃因子时，怀尔德却教人直面人生，在人生无意义的背景下下去爱、去感知，体味活着的意味。

《圣路易斯雷大桥》获1928年普利策小说奖，剧本《我们的小镇》于1939年再度荣膺普利策戏剧奖。14年后，描绘人类历史的剧本《我们牙齿的颜色》让怀尔德第三次站在普利策奖领奖台上。这一记录至今无人刷新。在另一个层面，怀尔德小说或戏剧的深度让很多人把他推到“最后的寓言家”的地位。怀尔德的寓言讲述毫无噱头，以平淡结实的表达探入人生深部。《我们的小镇》之末，西蒙·斯蒂姆森说：“在无知中浑浑噩噩过活；不停践踏着那些感情……那些与你们有关的感情。你们挥霍着时间，就好像你们能活一百万年似的。总是沉浸在自我为中心的激情里不可自拔……”怀尔德看到的“活的状态”即是眼前世界上每一个“我”的状态。

那些死者从《我们的小镇》的坟墓中爬出来闲扯，他们的语调“很平淡，不煽情，而且重要的是，不凄凉”，哀而不伤正是怀尔德的文字风格。面对“人生”，怀尔德之笔犹如庖丁之刀，他对硬骨、脂肪或敏感的神经区皆熟稔在心。他与很多作家的冷峻一脉相承，却保持自己“糖衣炮弹”式的冷，对此浅尝辄止并不作细细渲染。西蒙·斯蒂姆森说：“死者回到的幸福之所，不过是无知和盲目罢了。”活着的现实意义被怀尔德用“无知”和“盲目”表尽了。《圣路易斯雷大桥》中，阿尔瓦雷多船长在追思会上看透了人性的虚伪，他退出来说：“那些淹死的人是幸福的，伊斯特班……奏响人生的交响乐，怀尔德哀感的潜流若隐若现于乐曲的幽微处。然而，怀尔德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读者奠定“人生荒谬”的基调。即便是对准“爱情”，他也提出“爱的不平等性”，相爱的人总是一个爱得多一个爱得少。他表示最为珍视的“爱”都如此残缺和荒诞，又如何让“爱”照亮我们生命的全程？怀尔德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存在之车轮，生命形式无止境地轮回，但重要的是，在这机械的活动中，会有别处的力量介入来改变这一切。”怀尔德就此告诉每个人，我们最大的奇迹就在当下，在流逝不息的每一瞬，细咀和发现现实的价值，也许这才是最为结实的人生意义。

BBC

one

one